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漫步语坛的第三个脚印：汉语方言与语言应用论集（增订本）/詹伯慧
著.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6. 10

ISBN 7 - 81079 - 223 - 7

I. 漫...

II. 詹...

III. 汉语方言—方言研究—文集

IV. H1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9561 号

出版发行：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总编室 (8620) 85221601 85226581

营销部 (8620) 85227972 85220602 (邮购)

传 真：(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510630

网 址：<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暨南大学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暨南大学印刷厂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34. 625

字 数：698 千

版 次：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2 版

印 次：2006 年 10 月第 2 次

定 价：58.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序 言

桌上放着一摞文稿的复印件，那是詹伯慧教授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新著的结集《汉语方言与语言应用论集》的部分文稿。书架上放着一排詹教授编著或主编的专著：中国第一部《汉语方言概要》（袁家骅主编、伯慧参加编写；1960，1983 再版），《现代汉语方言》（1981，后又有日译本），《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詹伯慧、张日昇共同主编，共三大卷：1987，1988，1990），《粤北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1994）和《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1998），高校教材《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主编，四人合著，1991），《语言与方言论集》（1993），《汉语方言论集》（合著，1997），《广东话正音字典》（主编，2002），《广东粤方言概要》（主编，2002），《东瀛杂记》（1982），多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闽方言研讨会的论文集，还有堆放在书堆里的多册《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通讯》，记载着詹伯慧会长在历届学会的活动和讲话等。这只是詹伯慧教授撰写或主编的部分专著或论文集，且不说他发表的 200 多篇单篇文章。这样丰富的著作，詹公可谓多产学者矣！他还是新中国第一个由国家教委派赴日本进行长期讲学的学者。后来又多次应邀到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法国、美国等多所著名学府授课讲学。无怪乎他被公认为蜚声中外的汉语方言专家了。可他并不单单致力于汉语方言研究，他也十分重视宏观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语言教学和语言生活指导的研究，发表了许多有真知灼见的论文。例如，他到新加坡访问讲学，就详细了解了新加坡推广华语的种种有效措施，并把它介绍到国内来，对国内的语文工作有很大的启发和参考作用。他长期在广州暨南大学任教，并一直担任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主持了一系列国际学术研讨会，可说是国内最活跃的语言学活动家；他对广东省以至南方省份的语文工作十分重视，发表了多篇对南方群众语文观和语文生活很有影响的文章；他既主持了粤方言的正音工作，也策划和参与了广东省历年的“推普”工作。所以，詹伯慧教授不仅是一位造诣很深的汉语方言学家，而且是一位大有贡献的应用语言学家和积极贯彻推动语文政策的语言规划带头人。由于我对他前一项工作很有兴趣，又曾从事他所致力的后一项工作，因此当他提出要我给这部近著写一个序言时，我就很乐意地接受了。

这是伯慧同志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发表的论文汇集。此前有他 1980—1991



年的论文汇集《语言与方言论集》（1993，广东人民出版社），伯慧说那是他“在学术道路上留下的第二个脚印”；前此还有1982年日本东京龙溪书社出版的《汉语方言文集》，收录了伯慧“文革”前发表的十多篇汉语方言论文，伯慧说那是他“在学术道路上留下的第一个脚印”。这又是一个新的脚印，步步深入的第三个脚印！我以莫大的兴趣拜读了伯慧兄带给我的复印文稿和书架中的部分文章，并在阅读中感受到莫大的收获和喜悦。

本书文章大致分为四组：汉语方言研究全面的回顾与前瞻；粤、闽、客家等方言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深入思考，也包括语文教育与方言词典的编撰等；方言、共同语与双语制；粤方言近十几年来的新问题。或是综述，或是对相关工作的指导性意见。

《四十年来汉语方言研究的回顾》（1992）把我国运用现代语言科学的知识技术和方法来调查研究汉语方言的近70年，分为前30年和后40年两个阶段；后40年（20世纪5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就是该文所要回顾的，实际是全面回顾了新中国几十年的方言研究。它共分五小节：①从“冷门”到“热门”；②从“普查”到全面深入的研究；③从单点研究到成片研究；④从方言词典的编纂到方言地图的绘制；⑤一点想法。作者不但从20世纪20年代起的前30年，前辈为现代汉语方言研究奠下的初步基础说起，讲到新中国建国以来我国方言界的整个历程和成就，给予了恰当的分期概括和评价，有述有评，全面而不枝蔓，使人对这几十年的进展有了一个提纲挈领的清晰的认识，而且，在最后一节里提出了意见，他讲得很谦虚委婉，但是，实际是带有指导性意味的意见。作者讲到：我们汉语的方言实在太丰富，也太复杂了，尽管已经取得很多成果，但距离摸清汉语方言面貌的目标还相当远，任务还很重，需要解决的业务问题还不少。40年来微观的研究做得不少，对单点方言面貌的描写和分析较多，而对多方言的综合比较和大面积的成片调查却嫌太少；方言研究中的理论问题、方法问题，还有诸如方言与文化、方言与民俗、方言与社会等，都需有志之士去研究、去分析；还有队伍尚不够壮大，我们的学术活动还受客观条件的诸多制约，等等。这些都有待我们群策群力，大家来想办法，使汉语方言研究不断登上新的台阶。这哪里是“一点意见”，是成套的、系统的意见嘛！还是回到该文上一节的未了儿：“可以预见，汉语方言的研究已经不再停留在专家学者个人调查研究、个人出版专著的阶段，而是进入了一个大规模集结优秀兵力，在汉语方言的学术领域内共同策划、共同建设起几座巍巍学术大厦的时代了。”这是胸有全局的学科带头人（或者说是“联军司令部的领导成员之一”吧）对几十年方言研究的总结和期望啊！

2001年发表的《21世纪汉语方言研究展望》，从五个方面为进入新世纪以后汉语方言研究进一步的深入发展勾画了前进的蓝图：①继续完成20世纪



业已进行的一些重大工程，如 41 卷《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要在分卷本的基础上，结合汉语方言研究的其他成果，继续编纂一部综合性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组织力量编写大型的、反映整个大方言区面貌的专著。②汉语方言本体的研究，在前 20 年“腾飞”的基础上，例如深挖语音特点、联系语音现象和词汇语法现象思考问题，比较各大方言的关系，揭示方言底层现象，探讨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的相互影响和构拟方言历史面貌等进展情况，使新世纪的方言研究，在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朝着多视角、多层次的方向全面深入地持续发展，不断出成果、出精品。③方法上的革新。引进新技术、新思维，探索方言研究的新方法、新途径；面对新时代不同学科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现实，在汉语方言学与相关学科的结合方面打开思路、拓展视野，为汉语方言的研究带来更加广阔的天地。④方言研究在大力推广民族共同语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发挥它在现实语言生活中的作用，如何正确对待双语双方言交际问题。⑤进一步展开学术争鸣，使诸如汉语方言分区中的一些问题，如切实可行的分区标准问题，汉语方言应该在第一层次中分设几个大的方言区，从分区原则到具体分区，一些长期以来经常引起争论而未获共识的问题，通过学术争鸣，都有了进一步的进展——这是作者用“展望”的题目阐述他对新世纪汉语方言研究工作的期望和意见，值得我们重视。

早在 1963 年，伯慧同志就和黄家教、陈世民同志合著了题为《有关汉语方言分区的一些问题》的著名论文，提出以语言材料为主要依据，并从群众中着力搜集有关的人文历史资料，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尊重群众的语感，作方言、次方言和土语等不同层次的划分。经过几十年的持续努力，结合新发现的问题，《方言分区问题再认识》一文，又结合海内外学者的相关论述，对此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首先提出“方言界限的划分和方言分区不是一回事”，并以作者自己家乡就是闽、客兼用的双方言的过渡地带为例，提出“民系”的概念，讲：有双方言并用或混用的地区，这并不妨碍方言的分区，这样就跳出地理界限这个单一的框框，也解决了方言岛的问题。其次，关于汉语方言分区的原则和依据，因为经验更丰富了，见识更广了，关于如何在语言特征方面，在比较中既注意其差异性，又不忽略其一致性；既以语言特征为主要依据，又注意到语言以外的社会因素，意识到方言的形成和发展，方言的异化和趋同，联系到历史、文化、地缘等诸多因素，使方言的分区更加合乎科学的要求。然后在“区分汉语方言的语言条件”方面，讲到运用分区原则和依据的可操作性，联系到国内外同行的划分办法，提出作者个人的看法，有针对性，因而也有启发性。既然汉语方言分区很难一刀两断、泾渭分明，对于暂时难定归属的地区，就保留“系属未明”或“过渡性方言”，当然不失为可取之策。然后讲到汉语方言不同层次的分区格局，并具体讨论了晋语、平话和徽语



等问题，我认为这些都不失为持平之论。当然同行专家还可以就此继续展开讨论商榷。

《关于方言词的用字问题》、《汉语方言词典编纂中的几个问题》等文章，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不多谈。我只说一点：我很佩服作者既尊重学者考本字的研究，又重视群众约定俗成的方言俗字的使用习惯。对于两者的取舍，作者主张宜乎从众从俗，不必计较它符合不符合本字的写法。但是若有考出可信的“本字”（古字），则可将“本字”也一并列出，当然主要应从方便广大方言使用者的应用着眼。我赞成这样的群众观点。这也是语言文字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后一篇文章中，在收词标准当以地方口语为主要收录对象的问题上，作者也同样重视民间说唱、地方戏曲等方言文学资料，但对从文献上收集到的方言词语则要看在口语实践中是否存在，这就不至于囫囵吞枣，古今杂糅了。这是历史的观点，也是群众的、科学的观点，跟死抱着每个方言词都要考出“本字”来的好古癖者的观点是不一样的。作者说：“人们宁愿使用俗字而不愿使用有根有据的本字，这正是语言文字社会性、习惯性的具体体现。”不过他主张字典词典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让“本字”“俗字”“同音字”等并存并用，给使用者有选择的自由。但是字、词典也要“发挥一点引导的作用”，“凡出现一字多词或一词多字的，都明确表明词典选定规范的态度，以遏止各行其是之风”。“宽容”的“规范”，看似矛盾，但是阻力小，不绝对化，损失小，可能效果反而更好。我赞成这样的态度。至于释义，作者说：“方言词典并非只为本方言区的读者而编，要让不懂该方言的读者也能使用，在释义上就得紧紧抓住‘对比’这一环节，使词义十分清晰。必须配以纯粹的口语理据，才能尽显这类方言词的独特风貌。用例的取材，要求‘原汁原味’，完全上口，而不重书证，因为方言本质上就是地方口语。”这是极有见地的。

第二组文章是伯慧对十年来参加和主持历届粤方言和闽方言研讨会的回顾和思考。不单是介绍情况，也对这两大方言研究提出了期望。例如关于闽方言，他就提出大力加强“填空补缺”的工作，克服研究地点不平衡的现象，这是直率而中肯的。作者对有关情况比较熟悉，因此，他建议随着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开展，最好有一个共同研究闽语的民间学术团体来统筹协调闽语研究中一些重大课题的分工协作，以便把力量拧成一股绳，更有计划地开展调查研究工作。这显然是一个很好的设想。我想，当然不是说单凭国内闽语学者就做不好这件事，而是两岸学者合作共事，肯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关于闽方言研究的几点思考》提出许多课题，不深入其中，是提不出这许多课题的。文章说：“最近有人就现代汉语各方言的势力进行排队，认为最强势的方言在北方为北方方言，在南方为粤方言。除了这南北两大强势方言之外，



我想闽方言和吴方言也该属于强势方言之列。吴方言在中国大陆的影响力不亚于闽方言，但在中国大陆以外，闽方言的影响力大大超过吴方言。”这是事实，指出这一点是有益的。这更说明加强闽方言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语言与方言论集》（1993）一书虽然在“闽方言的分布”中提到“闽方言主要分布于福建、广东、台湾三省和浙江省南部以及江西、广西、江苏三省的个别地区”，但只主要介绍了福建省内的5个次方言的语言特征。当然，我们不能把一个大方言的描述局限在一个省的范围之内。本书在这方面就有了进展。作者把整个闽方言分为8个支系的见解是我所初见的。当然，作者提出的区别性特征还可进一步论证。闽方言的用字和读音问题有跟粤方言用字不同的特点，所以《思考》一文又进行了特殊的论述。至于由谁来组织跨省协作的闽方言全面综合研究，看来有必要组织一个民间的跨地区的闽方言研究会。在《海峡两岸开展闽方言之我见》一文中，作者有具体的建议。

詹伯慧教授自己是广东饶平人，他的家乡话属于客家话系统。饶平上饶客家话的语言特点已见1993年出版的《语言与方言论集》一书中。他对客家话研究有当然的发言权。因此，《广东客家话研究之我见》理当在本书中占有一席之地。他的《我见》之所以只谈广东，也许是出于他的谦虚。

《语言与方言论集》有6篇文章介绍粤方言的情况，本书又有几篇介绍粤方言或与之有关的文章。两个集子都把它们放在书末。我觉得它们对一般读者了解粤方言的概况是有帮助的，不赘。

前后两个文集都刊载了有关语言规范、语言规划以及有关方言和普通话的论文，本书更有两篇《论方言、共同语与双语制问题》的文章。基本上是同一论题，但论述绝不重复，而论述的深度则步步深入。我想，詹公把这两个集子比作他在语言学术道路上留下的两个脚印，是有道理的。这就叫做“与时俱进”。比如说，两书都有文章介绍新加坡推广华语的情况，都能给我们“推普”作参考。从1979年至1998年，前十年间，新加坡政府每年都举行一个推广华语月，当时强调的是“多说华语，少说方言”；后十年间就转移到“学习华语，认识文化”上来了。客观事实的变化当然引起介绍文章的不同，有了新的深度。同样是讲方言与“推普”，前一本书是讲如何利用方言研究成果帮助推广普通话；如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已经公布实施，经过前十年的努力，普通话的推广已经取得全民共识，就可以讲在语言的应用上，采取“该严则严、可宽则宽”，在词语的选用上可持“比较宽松”的态度了。这里肯定了方言在某种场合的作用，阐述“双语并存，有主有从，一种推广，一种保留”的语言运用格局。肯定“让规范化的民族共同语在社会语言生活中唱主角，同时也保留方言当好语言交际中的配角”。讲述“语言的规范化是发展的，而不能是静止的。要注意跟踪语言发展变化的新动向，注意了解语言使



用者的认识和心态，在调查研究上下足工夫”。这就是通过双语制，推动共同语的学习和使用。双语制是社会现代化的需要和标志。双语制对“推普”有利无害。双语制是现代文明的象征。这样的论述比单纯强调“推普”，更容易获得人们的理解和欢迎。

我对《论集》的学习还很肤浅，但是索序甚急，只好权当“文抄公”，以代我的学习笔记。读者诸君，肯定能比我有更多的收获。我能预见，本书的出版必能受到广泛的欢迎。

是为序。

王均

2002年9月

目 录

序 言	1
四十年来汉语方言研究的回顾	1
二十年来汉语方言研究述评	12
《方言》二十年述评	27
二十一世纪汉语方言研究展望	41
汉语方言的研究及其应用	45
——纪念吕叔湘先生	
当前汉语方言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53
方言分区问题再认识	59
关于方言词的用字问题	74
——以粤方言为例	
谈谈汉语方言与语文教学	85
汉语方言词典编纂中的几个问题	93
汉语方言词典收词小议	105
一部多有突破的大词典	109
——读《汉语方言大词典》有感	
《汉语方言大词典》：取舍之间见功力	115
——读《汉语方言大词典》的一些体会	
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123
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大有可为	133
——序《汉语方言语法调查手册》	
濒危方言的研究大有可为	138
——读丘学强《军话研究》	
留住方言留住根	144
——杂议推广华语与汉语方言	



同根同祖，同源同声	148
——漫谈海内外汉语言文化的互动	
粤语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152
把握方向 大力开展粤方言的研究工作	170
粤语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思考	175
粤方言语法研究的当前课题	181
历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的回顾	186
粤方言调查研究的新进展	191
——序《广西北海市粤方言调查研究》	
关于闽方言研究的几点思考	195
从历届研讨会看闽方言研究的当前课题	209
海峡两岸开展闽南方言研究之我见	214
小议潮汕方言的宏观研究	218
新世纪潮汕文化研究之我见	222
海南语言资源的开发大有可为	228
——读《海南闽语语音研究》	
中国大陆客家方言的研究与应用	235
不断进取，不断开拓	243
——在第四届客家方言国际研讨会上的讲话	
广东客家方言研究之我见	247
对香港语言问题的几点思考	254
新加坡的语言政策与华文教育	260
方言和普通话杂议	264
试论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	276
略论方言、共同语与双语制问题	282
再论方言、共同语与双语制问题	292
——在第三届双语双方言研讨会（国际）的讲话	
略论方言地区的双语应用问题	302
方言和规范化杂议	309



语言规范与语言生活的多样化	317
汉语方言调查与汉语规范化	326
略论语言规范与语言应用	330
再论语言规范与语言应用	337
当前一些语言现象与语言规范	348
当前语言规范工作的几点思考	353
——纪念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召开 50 周年	
广东语言文字应用调查的若干启示	359
推广普通话适应改革开放	364
经济发展与推广普通话	366
把语文工作推向 21 世纪	370
普通话“南下”与粤方言“北上”	372
当前“推普”的一些思考	379
试论粤方言地区的推广普通话工作	387
从实际出发思考香港的普通话教育问题	393
提高香港中文教学水准之我见	402
——兼论语文教学质量之评估	
语言文字研究突飞猛进的十年	415
——为《广州市志》(1991—2000) 而作	
广东粤方言的共同特点述略	424
粤北十县(市)白话的语音特点	438
粤西十县(市)粤方言的语音特点	444
略论广西“平话”	451
饶平上饶客家方言的两字连读变调	462
关于《广州话正音字典》	469
关于《广东粤方言概要》的编撰	474
师道悠悠——杂忆了一师	478
我所认识的王均先生	486



附录

视学术为生命，以服务社会为己任	491
——詹伯慧教授的成功之路	
詹伯慧教授简历	501
詹伯慧教授著述目录	515
詹伯慧教授小传	539
后记	541
增订本附言	543

四十年来汉语方言研究的回顾



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源远流长，从西汉扬雄编集的《方言》算起，已经历了近两千年的历史，而运用现代语言科学的知识技术和方法来调查研究汉语方言，则只有近 70 年的历史。70 年中又可分为前 30 年和后 40 年两个阶段。后 40 年也就是我们这里要回顾的：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到 90 年代初这个阶段。

一、从“冷门”到“热门”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兴起的现代汉语方言调查，在几位语言学前辈如赵元任、罗常培、王力等的大力倡导下，从 20 年代到 40 年代，曾作过几次综合性的大型调查，也出版了一些重要的方言专著，如《现代吴语的研究》《湖北方言调查报告》《钟祥方言记》《中山方言》《厦门音系》《临川音系》《两粤音说》《闽音研究》《粤音韵汇》《华阳凉水井客家话注音》等。这二三十年的调查实践，为现代汉语方言的研究奠定了初步的基础，积累了一些可靠的方言材料，也显示出现代汉语方言研究的广阔前景和巨大潜力，使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开始受到语言学界的瞩目。但那时整个语言科学还基本上处于“冷门”状态，汉语方言的研究，在学术界也自然只能处于“冷门”的地位。

进入 20 世纪 50 年代，汉语方言的研究由于积极配合当时在中国大力开展的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话、汉语规范化等语文工作，一跃而成为中国语言学中的活跃部门。随着汉语方言普查的开展，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逐渐发展成为语言研究中的“热门”。这主要表现在：许多高等学校自 50 年代中期以后陆续开设了汉语方言学或汉语方言调查的课程，其中最早开设“汉语方言学”的是北京大学的袁家骅教授。当时的高等教育部颁发了综合大学中文系的课程设置及教学大纲，把“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列为必修课程，袁家骅教授还为这门课程草拟了教学大纲，供全国各地高等学校使用。与此同时，为了培训推广普通话和方言普查的干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中央教育部从 1956 年起联合举办了几期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培训了近 200 名方言调查人员。这期间各语文杂志、高等学校学报以及一些社会科学的学术刊物，陆续刊登了一些反映汉语方言调查研究成果的文章；汉语方言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和方法问题也开



始受到注意。国外关于方言研究的理论和经验也被介绍到中国来，汉语方言工作者的视野逐步扩大，队伍也逐渐壮大。从 50 年代初期到 60 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前夕，这十来年间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发展很快，可说是 40 年来第一个高潮时期。此期间不但中国大陆的汉语方言研究蓬蓬勃勃，而且港、台及海外的华裔语言学家和某些外国的著名汉学家，也在继承 20 年代以来汉语方言调查传统的基础上，积极进行开拓汉语方言研究新园地的的工作，出现了不少的成果，如赵元任对广东台山方言、安徽绩溪方言的调查，董同 对台湾闽南方言的调查，杨时逢对台湾桃园客家方言的调查，丁邦新对如皋方言的调查，易家乐对中山隆都方言的调查，包拟古对厦门方言的调查，桥本万太郎、罗杰瑞对闽方言、客家方言的调查等，都是在这十来年间整理出成果发表面世的。从此，汉语方言的研究就开始作为国际性汉学研究（Chinese Studies）中重要的一环了。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后，开始了“十年动乱”，在此期间，整个学术研究陷于停滞状态，汉语方言研究同样也偃旗息鼓，没有进展。这段期间唯有台、港和海外的方言学者，仍然在开展调查研究，并继续获得一些成果，如杨时逢的巨著《云南方言调查报告》和《湖南方言调查报告》，余霭芹的《粤语研究》（第一卷），桥本万太郎的《客家方言》，村上嘉英的《现代闽南语辞典》，张洪年的《香港粤语语法研究》等有影响的著作，就都是在我国“十年动乱”期间发表的。1976 年“四人帮”垮台，在“拨乱反正”，经过一番准备以后，到了 70 年代末，学术界枯木逢春，重吐新绿，中国语言学也重新得到发展，使汉语方言的研究很快就又进入一个新的繁荣阶段。从 1979 年起，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空前活跃，可说是 40 年来的第二个高潮时期。这时期的十多年，汉语方言研究蒸蒸日上，硕果累累，美不胜收。主要的表现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份专门刊登汉语方言研究成果的定期学术刊物《方言》季刊于 1979 年 2 月创刊；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于 1991 年 11 月正式成立；汉语方言学术活动日益频繁，两年一度的全国学术年会从没有间断过；一些地方性的方言研究学术机构接踵诞生；汉语方言学的教材建设、汉语方言辞典的编纂、汉语方言地图的绘制、汉语方言志书的编写等多方面的汉语方言研究工作正不断地发展；国际间的交流日渐增加，以汉语方言研究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接连举行，并且已向着定期举行的方向发展，如国际粤方言研讨会从 1987 年在香港举行了首届会议以后，1989 年、1991 年又接连在广州和澳门举行了第二届、第三届研讨会，今后还会继续举行下去。此外，吴方言在 1988 年也举行过一次国际研讨会（香港）；闽方言已举行过两次国际研讨会（1988，1990，福州、汕头）。随着汉语方言工作的发展，汉语方言的研究队伍也不断得到壮大，我国高等学校和语言研究机构从 80 年代迄今，已培养出一批攻读汉语方



言学的硕士研究生；从1991年起，几位第一批攻读汉语方言学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也分别进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广州暨南大学。如此等等，说明汉语方言研究正越来越受到语言学界的重视，称得上是欣欣向荣。目前，这种兴旺发达的局面还在继续保持着，可谓“方兴未艾”。

二、从“普查”到全面深入的研究

40年来汉语方言的研究是以20世纪50年代的“普查”为契机而大力发展起来的。“普查”就其调查范围之广，参与人数之多来说，都可称得上是方言研究史上的“空前”之举。但“普查”的主要任务在于初步调查方言的语音情况，了解各地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别，整理出对应关系，为编写《学话手册》，帮助各地人民学习普通话服务。从1955年开始用了不到3年的时间，动员起各地语文专业的师生来参与这一工作，结果普查了1849个点，约占当时全国2298个县市的80%，编出了十多种方言概况一类的调查报告和300多种《学话手册》一类的小册子（正式出版72种）。这样大的成绩在促进普通话的普及和汉语规范化中无疑产生了显著的作用。“普查”虽然是粗线条的，但与此同时，伴随着“普查”而掀起的“方言调查热”，却对汉语方言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1955年到“文革”前夕，这十年间，也有一些方言工作者着手对某些方言作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并且发表过一些颇有分量的方言研究著述，例如李永明和詹伯慧分别发表的《潮州方言》，就是对广东闽语的相当详尽的描述。李荣关于温岭方言的研究，郑张尚芳关于温州方言的研究，王福堂关于绍兴话的研究，许宝华、汤珍珠关于上海话内部差异的研究，黄家教关于广州话语音结构的研究，陈慧英、白宛如关于广州话和普通话的比较研究等，也都是“文革”前就开始进行，并且已获得了一定成果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结合“普查”干部的培训，在汉语方言调查方法的探讨和普及上，有了明显的进展。例如语言研究所及时编制了一些调查表格和指导调查实践的用书，《方言调查字表》（1956）、《汉语方言调查简表》（1956）、《方言词汇调查手册》（1957）等都在此时先后出版，著名语言学家李荣先生给培训班学员讲课的稿子《汉语方言调查手册》和岑麒祥先生的《方言调查方法》、《国际音标用法说明》以及《中国语文》杂志社编的《语言调查常识》等书，也都是在1956、1957两年内问世的，密切配合了方言调查工作的开展。

随着高等学校汉语方言学课程的开设，20世纪5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就由袁家骅教授主持着手编写汉语方言学方面的教材。经过一番筹划，在袁先生所编讲义的基础上，由几位年轻的助手分头执笔，最后袁先生总其成，通审而定稿成为一本50万字的《汉语方言概要》。此书为中国有史



以来第一部比较系统、全面阐述汉语方言概貌的专著，它的优点是材料丰富翔实，论述相当全面，语音方面的描写从平面到历史，从个别到一般，大体上反映了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几十年间汉语方言调查的成果。方言词汇和方言语法的特点在本书中也得到相当的重视。尽管这本《概要》限于客观条件，还存在着部分材料不够丰满、不够准确，各章体例不一，内容分量不够平衡等不足之处，但作为草创性的著作，筚路蓝缕之功实不可没。与《汉语方言概要》配套编纂的两本资料性的著作：《汉语方言字汇》（1962）和《汉语方言词汇》（1964），也是“文革”以前备受海内外学者关注的专书。《字汇》包括各大方言17个地点的2722个字的读音，《词汇》收入各大方言18个地点的905条词语，对于方言研究和一般语言工作，都有参考的价值。

“文革”前十多年间问世的汉语方言专著总的来说数量是不够多的，就已经发表的一些论著来看，如前所述，虽然也有一些颇具分量、着意深入之作，但大多限于自己调查自己的方言，而且多局限于语音特点的描写，成果毕竟还比较有限。其中被公认为最有水平的杰出著作是《昌黎方言志》。这本以《方言志》面目出现的著作，是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学者们深入河北省昌黎县调查后编写出来的。此书吸取以往几十年汉语方言调查的经验且有了较大的改进，显著的特点是调查细致，记音严格，重视方言词汇和民间文学材料，注意平面比较。在编写体例上，由概况介绍而转入语言结构的分析，书中还附有十二幅方言地图和详细的分类词汇，这些都是超越前人且有所创新的。《昌黎方言志》的出版，反映出方言研究已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显示出“后出转精”的特色。此外，在20世纪60年代初还有两部汇集方言“普查”成果而影响颇大的方言调查专著：其一是1960年正式出版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其二是尚未正式出版，但作为“讨论稿”印出，在方言学界广为流传的《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1962—1963）。《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全书包括三部分：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的分区，字音对照表（排列出20个方言点的2601个单字音），常用词对照表（排列出21个调查点的567条常用词和词组）。通过这三个部分的内容，第一次提出江苏省方言分区的标准，并阐明各区的特点，同时，也第一次向读者提供了江苏、上海各代表点的语音和词汇的材料，可惜的是这些词汇的材料没有注上音读，外地人不易理解。《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讨论稿）规模很大，上、下两大册，100多万字，初步记录了福建各地方言，排比了材料，归纳了特点，进行了分类，还绘制了一些反映方言特点分布情况的地图，其内容之丰富，在闽方言研究史上无疑是空前的。可惜的是这本巨著虽经过长期的复核和审订，至今尚未能正式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60年代“普查”结束后，各省（市、自治区）组织编写的《方言概况》其实大都已经以油印或石印的方式印出来征求意见，只可惜没来得及审



订定稿便来了“十年动乱”，结果这些《方言概况》不但没有出版，有的连原稿也散失了。现在我们从仅存而且能够流传开来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及《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讨论稿）中，多少也就可以略窥各省（市、自治区）方言“普查”成果之一斑。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万马齐喑”之后，一旦春回大地，方言研究者才又抖擞精神，迅速向着开拓进取、全面深入的方向迈进。在开拓研究领域方面，近十多年间，各地语文学杂志及学术刊物陆续发表了一些方言调查研究的论文，从这些论文来看，其内容的方言覆盖面大大扩大，中国大陆从南到北各个省（市、自治区）以及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的汉语方言，全部有人进行调查研究。就拿台湾来说，20世纪80年代以前，那里的方言几乎清一色是由台湾学者包了，1983年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张振兴先生的《台湾闽南话记略》，才改变了这种局面，现在岛外学者关注台湾方言问题的日渐增加。澳门的粤语长期以来也是未有人认真研究过的，80年代后期，趁着“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课题组的触角伸入澳门之际，热谙澳门方言的林柏松先生就对澳门话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发表了《澳门话研究》、《近百年来澳门话的发展》等文章，引起人们的注目。近十多年来，方言研究覆盖面的扩大也表现在地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汉语方言，已陆续有学者注意调查，并且发表了一些调查成果。例如周磊、刘俐李两位就对新疆地区汉语方言作过相当全面的调查，使人们对新疆的汉语应用情况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此外，对于某些方言比较复杂的地区，特别是多种方言接壤的地区，近十多年来在不断开拓的思想指引下，方言工作者也有意识地给予较多的关注，使这些地区的方言面貌日渐明晰，分区、归属等问题也逐步得到解决。拿皖南徽州地区来说，早年赵元任等学者就注意到这里汉语方言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并且亲自记录过胡适之先生的口语，在20世纪60年代就发表了《绩溪岭北音系》和《绩溪岭北方言》（与杨时逢合写）。但是，对皖南方言进行比较全面的调查研究，却是80年代以后的事。众所周知，近几年来，郑张尚芳等学者一直在对皖南徽州一带的方言进行调查，日本学者平田昌司80年代初留学我国时，也对徽州方言很感兴趣，曾作过田野调查，发表过几篇有关的论文。又如浙江南部吴、闽方言接壤的地区，过去人们知之甚少，近十多年来，颜逸明等学者陆续开展了比较深入的调查，如今这一方言交错地带的方言真相，吴、闽方言的分界等问题，也有了比较明确的答案。再如处于天涯海角的海南岛汉语方言，30多年前我曾发现岛南的崖县存在着两个不属于闽语系统的方言岛，其中一个是属于北方方言的“军话”，为此，1959年我写了介绍海南“军话”的文章，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关注。80年代以来，随着海南方言调查工作的开展，现在已知不但南部崖县有“军话”，北部儋县也有“军话”，就连广东东部属闽方言



区的陆丰县，近年来也发现有叫做“军话”的方言岛了。看来，在闽方言区的范围内，从福建到广东到海南岛，都存在着属于北方方言的方言岛，这种现象联系闽方言区人民的历史背景是大有文章可做的。随着方言调查覆盖面的不断扩大，过去我们方言工作者最感困惑的是“那里的方言没人调查过”这一难题，今后将会逐步得到解决。进入90年代，我们已可以这样说，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汉语方言，或多或少都已有过调查研究的记录，完全未有方言工作者接触过的“处女地”，为数已越来越少了。

近十多年来，在拓宽方言调查覆盖面的同时，汉语方言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专题研究的不断深入，许多方言研究者把较多精力倾注到通过细致的调查，更多地挖掘方言特点，揭示方言内部差异上来。比起“文革”前十多年来，近十多年汉语方言研究的主流已明显从一般的记录描写转向深入探索各种方言现象和规律方面来。例如在语音的研究方面，单是“连读变调”这一项，《方言》杂志就发表了许多的文章，其中讨论苏州方言的连读变调，就达六篇之多。这些文章都是经过认真、细致的调查，能够言之成理、自圆其说的。又如对于方言发展变化中形成的“新派”“老派”问题，方言词语中和语法中的特殊现象问题，方言的“本字”问题，文白异读问题，相互影响问题等，也都有不少深入探讨的文章发表，显示出研究题材的丰富多样，研究水平的日渐提高。长期以来方言研究侧重语音而忽略词汇、语法的偏向正在逐渐扭转。《方言》杂志创刊以来，已发表文章近600篇，其中研究方言词汇语法的逾百篇，朱德熙先生就写了好几篇运用汉语方言素材论述汉语语法的文章，引起汉语语法学界的重视。不久前朱先生关于认识方言语法研究、历史语法研究和现代汉语标准语语法研究之间密切关系的精辟论述（见《中国语文》1992年第1期80页），再次强调了方言语法研究的重要作用。今后汉语方言语法的调查研究，必将会进一步受到重视。

汉语方言研究的不断深入，积累下来的方言素材的不断增加，也为汉语方言学的理论建设和教材建设提供了条件。十多年来，对方言研究方法问题，方言分区问题，方言与文化关系问题，方言的发展趋势问题，“双方言”的应用问题等，都有所议论，在《方言》及其他学术刊物上发表过一些文章。至于汉语方言学教材的建设，自从1960年袁家骅教授主编的《汉语方言概要》问世以来，整整20年未见新的教材问世。而近十几年，却连续出版了几本作为高等学校教材的《汉语方言学》或《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这几本教材中，尤以近期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40多万字的《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最引人注目。此书由詹伯慧、李如龙、黄家教和许宝华四位方言工作者共同编写，詹伯慧任主编。全书材料翔实，内容丰富，体例完备，为从事方言调查、方言教学的人提供了堪称方便实用的参考书。